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一个国家有了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强大的知识体系；有了强大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强大的解释体系；有了强大的解释体系，才能对内凝聚共识和对外抓住话语权；有了话语权，才会有强大的软实力；有了强大的软实力，才有条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祝灵君

在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个讲话指明了当代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问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交流、比较、借鉴中实现大发展。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做好准备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要坚持古今中外法，承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承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前些年，海内外曾就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发生过争论。一些学者提倡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建议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放弃；儒学是我国在漫长的文明发展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不是说谁想去掉就能去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是发展和前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立场、观点、方法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性因子。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价值，恰恰相反，“承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学习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这也是“社会科学补课”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主义”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于是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舶来的技术名词成为一种时尚，熟练掌握这些词汇的人成为专家，在评价本国国情时不一定“接地气”，却品头评足，指点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称希腊。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国界，也没有国界。说没有国界，是因为各种宏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比较、借鉴，并寻找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说有国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文明背景，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而从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某些区域得出的制度经验或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是多样化的，应该允许有多样的价值和多样的生存模式。用一种“舶来”的价值和标准来批判本土的价值和经验，本来就会犯常识性错误。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模仿某种制度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这个制度一定会运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处处蕴藏着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假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实际上，所谓落后，主要是指一国现有的理论储备滞后于本国生动活泼的发展实践，是理论解释不了本国实践的落后，不是相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落后。

最后，以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为基础构建宏观理论，以立足于人类共同价值、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构建中观理论，以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借鉴、比较构建微观理论，从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熟的、宏大的哲学体系，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用了170年左右的时间（1840年至今），反复探索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寻找一种“赶超西方”的文明道路，在立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些都可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的学术资源。在构建微观理论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命题、中国故事时，胸中要有“大棋局”，把中国放置于世界舞台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研判，确立问题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如此就能产生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让这些概念、理论逐步定性。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反复比较形成的。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西方社会时，从来没有忽略与东方社会的比较，甚至在其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中还提到了世界各国几百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有清代著名的货币专家王茂荫。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国际化

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第一次访华时指出：你们拥有伟大的古代智慧，你们具有圆满的哲学思维，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们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武装自己，有朝一日虽然你们以为自己独立了，但实际上你们是被征服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从利玛窦以来西方使者为何在几百年内挟西方科技文明之优势向中国输出文化，却没有一个成功的？他作了如下回答：“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收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如今，“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

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来自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表明，人类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都需要对话，需要交流和交融，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如此。过去，东方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西方，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16—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并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也影响了东方。当今世界，东方的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实践，以借力于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经验，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影响世界。实际上，通往全球化之路是一条各民族彼此学习借鉴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合作与欣赏则共赢，斗争与排斥则两败。

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打”的历史，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饿”的历史，使中国人“富”起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结束中国“挨骂”的历史，使中国人“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基本历史阶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大国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具体举措。

当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牢牢抓住我国历史上正在经历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系统地研究大国治理向强国治理转变的基本方向、基本道路、基本条件、基本规律，同时也利用学者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已经融进了当代中国文化，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要发生，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会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新时代。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功地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时，“中国故事”的解释体系就基本完成了，我国就会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话语权。那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对外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学习贯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

加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权之争的凸显，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重要特征。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之一，也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创新传播方式，增强传播效果。

□ 范大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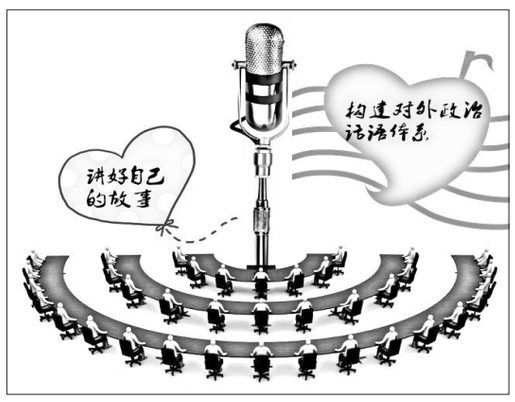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在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中，我国话语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不相称，尤其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还远未达到外国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的程度。加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进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选集》的翻译。1961年中共中央设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现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的前身）翻译的多语种版《毛选》四卷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奠基之石、开山之作和传世经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比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集体人权、科学发展、协商民主、新型大国关系、和谐世界、中国梦等。而由这些重要概念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经过几代翻译人和传媒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本身就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愈发富有魅力，并倒逼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而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在不断进步与完善，但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尚处于“毛坯房”阶段，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只是独立存在的钢筋或混凝土部件，彼此之间没有很强的衔接性和连续性，看起来就不甚完美，解释起来更加费劲儿，甚至受到极大的不可译性的困扰。这说明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而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自然也就有一个相对滞后的构建过程。

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相对滞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谈自己的理论多，看别人的反应少。近年来，我国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投入极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外宣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搜集国外舆情，特别是关于外宣效果的反馈调研方面仍然做得不到位。其次是谈中国的道理多，讲中国的故事少。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报道，无论是选择角度、新闻素材，还是叙事结构、观点安排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立场和逻辑，连“中国议题”也往往为西方媒体所设置。这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评价，也损害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其实，我们完全应该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体制机制的优越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开去。比如“APEC蓝”、海地维和、也门撤侨和反腐败斗争等等，这些故事讲好了，会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更益于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再次是谈概念的内容多，说分析的内容少。国外的政治话语体系构建工作更多地依靠智库或者有影响力的学者来完成，其一些极具说服力和非常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媒体报道和传播的主要素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更像是一条封闭的环线，缺乏有效的联络线衔接，造成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有体无系、有网无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加强交流方式与传播手段的创新，以效果作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准。在交流方式上，可否考虑对外推介政治话语时，更多地介绍一些该政治话语产生的背景和经过，而非一味地靠高频率轰炸进行强制性输出。同时，在对外交流时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而要注重和外国受众的互动，做到有问有答、越辩越明。另外，在传播手段上，不能仅仅依赖新华社、中央台等国家级媒体正襟危坐式的发布，也要采用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的宣传手段。比如出品一些对比中美政治体制的动画片系列，出版一些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漫画式读物，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传播一些声画并茂、生动有趣的政治“软新闻”，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推出一些结合时事解读政治热词的幽默脱口秀，等等。总之，只有增强交流和传播的吸引力，才能使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更具生命力。



加强科学性和针对性。不可否认，在国际传播领域，我国的政治话语处于弱势，既没有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政治话语体系，也没有获得外国受众的普遍认可。因此，从科学性来讲，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既要尊重翻译的客观规律，又要考虑外国受众的阅读习惯，更要顾及他们的政治文化土壤，善于采撷人性中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东西为我所用，以达到最好的外宣效果。另外，从针对性上来讲，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要有的放矢，符合引导外国受众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这一主观要求。当然，科学性和针对性是建立在对对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知己知彼，科学性和针对性才有意义。

加强思想建设与人才培养。从前文所述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可以看出，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自身的思想建设与人才培养不充分所致。一方面，要搞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做好“对内宣传教育”，强化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翻译队伍的政治素养。另一方面，培养一大批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知识结构完整、外宣经验丰富的人才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先说思想建设：政治理论还存在着改进和完善的巨大空间，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者及时归纳、科学总结、合理构建、完美诠释，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夯实基础。积极挖掘并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话语权并实现良好国际交流的起点。再说人才培养：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提高政治学研究者及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也需要培养深谙彼此话语体系的高级翻译精英。只有这样，才不会把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简单地固化为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理论塑造人才、媒介传播人才、话语转化人才都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必备基石。

专家视点

思想库的意识形态属性

□ 刘　珺

思想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独立性是思想库的重要特征，包括运用开放性思维对事实进行客观分析的思想独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影响的经济独立。独立性构成了思想库权威可信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思想库应坚持中性立场、摒弃意识形态呢？

探究思想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从思想库最为繁盛的美国开始。美国思想库多达1800多家，顶级思想库不胜枚举。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素有“民主党的影子内阁”之称，强调社会福利，提倡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支持温和、宽容的对外政策，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同为自由派智库的代表；美国传统基金会则与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等同为共和党的智囊机构，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政府管制经济，主张强硬的外交政策，被誉为保守派的“忠实代理人”。英国智库也具有明显的党派标识，费边社、青年费边人、公共政策研究会是左派智库的典型，亚当·史密斯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则是右派智库的典范。德、法、日、韩等国的著名智库也都与政党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由此可见，独立与中性是相对的，思想库也需要意识形态的旗帜。无论“左右之争”还是“自由与保守之争”，都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表达。

思想库植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诞生之时就带有意识形态的方向感。中国古代思想库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作为齐国君主设立的学术兼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中后期直至以后各种思想流派、执政主张发展的源头，如汉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黄老之学，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以及道、法、墨、名、阴阳五行、纵横之术，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现代思想库意识形态的色彩更为浓厚。内政方面表现为党派间鲜明的政治主张。美国思想库历来宣称自身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事实上其影响力直达美国政治核心，是政府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得温·福尔纳曾直言不讳，“我们的作用是努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子——首先是国会，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媒体”。最能体现美国思想库与政界密不可分的就是“旋转门”机制，即学者和官员之间的互相流通。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现任的研究员中半数以上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而学会中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就有超过30人之多。

外交方面思想库则充当了政府外交的“第二轨道”，代表一国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思想库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政治取向十分鲜明。在对华政策上，该中心提出，美国要使用“巧实力”应对中国崛起；对印政策上，提出美印是“天然联盟”；对整个亚洲地区，倡导重塑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政治主张大量转化为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战略和外交实践，已经发展成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影响最大的思想库之一。

思想库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达路径日趋多元化，包括刊行出版物、组织研讨会和培训、实施项目研究等，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通过媒体展示其政治主张。即使《纽约时报》、NBC广播、FOX广播等标榜公正、透明的主流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标签，这一点在其对华涉及人权、自由等问题的扭曲报道中可窥见一斑。

由上可见，思想库是以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为服务对象，它的产品是高质量的思想，而意识形态是思想的锚。“非营利性”与“意识形态中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非营利性组织追求非财务目标、形而上的目标，但其意识形态含量绝对不会少。

因此，中国思想库建设的指针应有意识形态的“纲”。即：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制高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思想库的关键，更关乎党的执政信念、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唯有坚持意识形态的“纲”，才能打造出定位明晰、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为实现中国梦建言献策。

新时期论坛